

污染型环境犯罪中的因果关系认定探析

钟 玮

(江西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现象愈演愈烈,解决环境污染方面的刑事对策问题也越来越被重视。其中关于污染型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判定已成为环境犯罪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我国污染型环境犯罪存在较为频繁且难以解决的三个与因果关系相关的问题,分别是因果链条形成难、污染型环境犯罪证明标准高、多因一果刑事责任归属难。从客观归责理论与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中截取精华解决当前最为主要的三个问题,能更好突破污染型环境犯罪的困境。

关键词: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客观归责;疫学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4-0080-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4.013

On the Causa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ZHONG Wei

(School of Grammar,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China 341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criminal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e of the thorny problems in environmental crime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causation in polluting environmental crime.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related to causation which are more frequent and difficult to solve in our country, and which are difficult to form causal chain, high proof standard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difficult to attribut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ulti-cause and one fruit, and to solve three main problems by intercepting essence from objective imputation theory and causal relation theory of epidemic science. And then the predica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can be better broken through.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causality; objective imputation; epidemiological causality

一、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现状

刑法因果关系作为刑事责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确定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与这一危害结果之间存在事实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重要前提。对于传统犯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通常并不困难,但对于环境犯罪由于其隐蔽性、多变性、复杂性等,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存在着较大的阻碍。

近些年来,河川与海洋污染、空气污染、大气层失衡、土壤污染以及核物质污染等所引起的各

种危害,使得环境大规模地受到破坏。这些自然及生活条件的破坏,在全世界范围内迫使司法工作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法律保护措施。环境刑法中将环境犯罪分为两类:一类是污染型环境犯罪,一类是破坏型环境犯罪。污染型环境犯罪作为环境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备受立法与司法工作者的关注,其中关于污染型环境罪当中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则成为重中之重。我国对于污染型环境犯罪方面的惩治较为薄弱,虽然在逐步减少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但仍然存在着环境犯罪难以得到相应惩戒或者是惩戒责任不清等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与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密不可分的

收稿日期: 2019-03-24

作者简介: 钟玮 (1995—), 女, 江西赣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关系。

二、国内外污染型环境犯罪中的因果关系理论

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方面，国内外有较多理论成果。笔者在此对主要的因果关系进行介绍与分析，试图汲取其中的优点加以借鉴。

（一）条件说

条件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条件说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认为影响结果的所有条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显然是无法说服大众的。其实对于条件说而言，其存在的问题不仅仅限于此。事实上，条件说无法处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如对于累积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假设因果关系都无法得到妥善处理。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以下补充理论：1. 条件关系修正说；2. 个别化说；3. 超越性因果关系。其实这些补充理论已经超出了条件说的基本公式，对于条件说的限制或修正，是一方面肯定条件说的基础条件，一方面又突破条件说的基础条件，否定所有条件的同等重要性，最终陷入自相矛盾境地。条件说是因果关系学说的基础性理论。它为后来相当因果关系等学说提供了借鉴意义，其优势是不容置疑的。但其缺陷也显露无遗，特别在污染型环境犯罪中。污染型环境犯罪中较为简单的因果关系能够适用条件说，但对于大多数污染型环境犯罪而言，其污染主体、污染源以及其中的因果路径往往是复杂多变的，若根据条件说的理论，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共同行为下发生的结果，其行为主体都避免不了承担同等责任，这种处理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二）相当因果关系

相当因果关系学说的提出源于当时民法上判断客观归责性的因果关系的观点。具体而言，该学说也分为三个具体的主张：一是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该学说站在一般理性人的立场，认为以一般理性人的立场判断行为时存在的全部情况或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得出其行为是否有无相当性。二是主观上的相当性因果关系说。该学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为行为时已经认识和可能认识的情形为基础判断有

无相当性。三是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该学说想站在两学说中间找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标准，认为应以一般理性人视角判断行为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行为人以其特殊的（身体状态、阅历、环境等等）状况对行为产生不同因果发展进程为标准判断其因果关系。折中说也因其适用的科学与合理成了相当因果关系的通说。但是折中说也有人提出了其缺陷。客观说当中以一般理性人视角判断难以得出结论，比如关于污染型环境犯罪中因果链条复杂、要具备很高的科技水平或者几乎难以用科学证明其必然性存在的情况，要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去判断，往往会主观归罪。

（三）疫学因果关系理论

疫学因果关系是日本学者结合法学与防疫学相关科学知识而形成的一种因果关系判断方法。该理论旨在于医学、药理学中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因素与基于它的疾病之间找寻更加合理的方法，即只要通过统计学的大量数据归纳分析的方法符合高度盖然性，即使无法用病理学、防疫学进行科学证明，也肯定其因果关系。^[1]在环境犯罪领域，对人类而言尚存在一些未知的问题，难以用现有科技完全释明其因果发生过程，因而需要借助疫学上高度盖然性的认知方法弥补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之不足。疫学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采用了推定的法则。这种推定法则的根源来源于经验法则，即根据经验观察前提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某种固定化、形式化的关系，就可以通过证明前提事实来证明推定事实。

疫学因果关系虽然有利于解决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错综复杂、科技水平局限性的问题，但也遭受质疑。其一是疫学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存在着有罪推定的嫌疑。^[2]其二是疫学因果关系更加关注事实方面的因果关系——“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方法，肯定其间存在高度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因果关系”，这说明该学说只能解决事实因果问题。其三是关于污染型环境犯罪，事实因果关系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刑法对环境权、生态法益的危险标准的具体衡量，在这一方面疫学因果关系无法进行具体的统计，这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分清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四）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完全的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其可分为“归因”与“归责”两部分。归因解决通过因果关系理论解决事实问题，归责通过客观归责理论解决事实评价问题。这包含三项内容：1. 行为对客体制造了不被容许的风险；2. 这个不被容许的风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了；3. 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结果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在这三者都同时集合时，这个由行为人所导致的结果才能归结于行为人。客观归责说吸取了刑法理论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观点，发展成为刑法客观归责理论的内容。^[3]

客观归责理论相较而言的优势较为明显。其一，客观归责理论将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体现从法律规范的约束性角度来考察刑法因果关系，凸显了刑法刑事立法的精神与刑事立法的目的，符合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加强了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的衔接，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在污染型环境犯罪方面而言，就是《刑法修正案（八）》改变了污染环境罪的客体，不再以实害结果作为必备要素，从而从单一秩序法益朝着生态法益、秩序法益其他法益并存的多元法益体系发展。《刑法》第338条从结果犯向情节犯的转变符合立法宗旨和现实需求，“严重污染环境”既包括“严重地污染”也包括“严重的污染”^[4]。其二，客观归责理论在遵循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归纳出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等规则。这些规则的归纳其实是对刑法规范化下的定罪量刑具体化的标准，它们本身都是实质的标准。这些规则适用于具体的案情中，在具体的案件中进行斟酌和细化，根据不同情形规定不同标准和规则，而不是当做原则适用于一切案件，作为所有案件的衡量标尺。这体现着归责的具体化与个案化，解决了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标准不明、证明标准过高的问题。

三、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主要问题

（一）因果链条形成难

首先，污染源难以查清。环境污染来源于工

业、农业及日常生活，污染物种类繁多。这些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植物、动物以及生存环境，由于其具有认定技术和方法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所以常常难以查找污染源头。其次，因果关系多变性。导致因果关系多变性的原因错综复杂，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这些情况都是普遍存在的。另外，由于个体差异、环境差异、气候差异、时空差异都将导致因果关系朝着不稳定的因素发展。即便是有相应的结果作为参考依据，但是就绝大部分结果所呈现出具体的污染物而言，它们在人们发现之前进行着各种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反应，是逐渐消解还是逐渐扩散，是病理毒理之间相互转化还是一次次的进行叠加累积，这些情况大都是当下科技无法预测和证明的。所以必然会使因果关系判断存在误差和偏离，甚至无法证明因果关系。其三，时间周期性长。很多污染行为的结果都不具有即时性的特点，比如说大气污染、磁污染、噪音污染等等，其总是要经历漫长的周期才能逐渐显现。其结果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环境或者人体出现无法自愈或无法承受时而爆发出来的。这些具象化的结果与污染行为的发生产生了时间上的间隔，从而难以确认因果关系。^[5]这些问题的涌现归根结底是因为现有科技对污染物质本质及其发生机理的认识局限，破解之道的根本还在于提高科技发展水平、积极探索污染致害因子的科学机理。但科学技术并非一蹴而就。现阶段应当主要探索如何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界定环境污染刑事法益。它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危害结果，也可能是生态法益、环境权的侵害。这些法益的侵害需要具体的衡量标准和尺度。界定不同类型污染的标准才是真正解决因果链条形成的关键。

（二）污染型环境犯罪证明标准高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证明标准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3条明确规定了在普通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是《刑法》实施“禁止有罪推定”基本原则的体现。^[6]污染型环境犯罪并无特殊规定，但实际上在事实证明难度较大的环境污染案件中，证明标准的要求过高，将导致

事实因果关系难以认定，从而发展到难以入罪归责的境地。降低相关环境犯罪的证明标准其实是解决环境犯罪归责难的重要措施，只是在降低标准的同时不违背刑法的排除合理怀疑是问题的关键。

（三）多因一果刑事责任归属难

所谓多因一果，主要表现为多个行为人的多个行为对损害结果的作用方向一致，共同发力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多因一果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多个行为之间责任分配问题。关于多因一果的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细分，区分行为人各自的责任份额是污染型环境犯罪中最为关键也是较为难处理的问题。在无意思联络的多因一果的情形中，各个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需要具体评价各个行为对结果发生的原因力的大小、主要排污种类及其数量。

四、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理论之综合选择

因果关系判断并非都是复杂且难以辨别的，但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确是其中最难以辨别的犯罪之一。所以，往往一种理论难以解决如此复杂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在污染型环境犯罪中应当综合应用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与客观归责理论。

第一，从运用两学说的必要性来说，我国污染型环境犯罪有必要综合疫学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理论，其原因如下：其一，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链条形成难，污染源难以查清、污染时间周期性长加大了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其二，污染型环境犯罪证明标准过高，难以通过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解决。^[7]其三，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适用的缺陷。就条件说而言，条件说试图通过一个统一标准解决因果关系问题，并且其主要关注与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发展进程，忽视法律因果关系的界定，所以难以真正发现污染型环境犯罪的真实法益，也就难以解决污染型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对于相当因果关系而言，其相较于条件说能够从相当性考虑因果关系，但是相当性的判断也往往缺失相应的标准，特别在相应环境犯罪中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评价环境污染的发展进程。其四，客观归责理论适用的合理性。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法学意义上寻因理论。作为法学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因果关系理论的适用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要通过刑法理论体系内的其他构成要件相结合才能予以成立。客观归责理论就是这样成立的。客观归责理论在归因方面限定为事实因果关系，在归责方面以是否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作为命题，在判断风险是否是现实是一并将刑法规范目的与形势政策考虑进去。它突出表现出规范的价值，更加明确因果关系理论的规范化含义，在规范化的体系下更加具体细化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其五，疫学因果关系存在合理的借鉴意义。疫学因果关系虽然存在有罪推定的嫌疑，但是疫学因果关系可以成为客观归责事实判断的部分。在事实判断部分，因为刑事犯罪因果关系对法规范并不关心，特别是环境污染案件更是如此。事实上，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体的发生机理对刑事因果关系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更何况在一些较为复杂的污染环境案件中，其污染发生机理更是难以从科技上加以证明，更不可能通过法学领域解释科学发生机理。法律规范仅仅解决社会生活的价值性判断，考虑事物之间通常的联系，它并不去求证科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疫学的因果理论欲建立新的自然科学规律，能够成为客观归责理论的一部分^[8]，更加有利于解决因果关系链条复杂问题。

第二，从疫学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理论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角度分析，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将污染环境罪中关于因为重大的污染事故造成重大的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严重的人员伤亡改为“严重污染环境”，这是从结果犯向危险犯的转移。因此，从归责的标准前移可以看出，当今社会与刑法法律及刑事政策更加重视环境污染案件的危害性，这也与客观归责理论中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相得益彰。法益保护提早纳入了刑法规制的范围，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官判断行为归责的标准也从具体的严重污染环境行为转移到在一定的地点、方式，一定的标准排放，一定数量的污染行为入罪。再者，行为侵犯的客体由一般实际的排污数量扩张为较为抽象的生态法益，无论是纯粹人类中心法益论还是纯粹生态学法益，以及在生态学中考虑人类中心的法益论，都体现了刑法对结果的标准不再单单从实害结果出发，污染型环境罪客体也因为刑法规范的变化而更为多元与广泛。其中刑法第338条

中的“严重污染环境”表述,既包含行为本身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也包含因环境污染给人的生命、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险以及实害的情形。一方面,包含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险或者实害可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另一方面,侵犯了环境权益则也可以认为是“严重污染环境”。^[9]这也体现了客观归责理论所一直主张的危险结果,更加容易判断因果关系,无需一定遵循事实因果关系下的结果。最后,关于疫学因果关系,在我国司法实例中也常常出现。譬如,非典期间某医院管理人员对非典病人处置不当导致16人感染非典的案例,由于当时对于非典的病理不是很清楚,传染途径及其因果进程不明,但通过统计学知识进行调查得出其概率较高,从而认定其因果关系。又如在骆某等环境污染事故案中,对于污染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判断,但以化工厂为中心检测发现,工厂周边的土壤含镉量随着离工厂距离越远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并且工厂周边居民身体内的含镉量也是随着离工厂越远其含镉量出现递减的趋势,而居民含镉量超标人群又主要分布在工厂500 m范围内,因此推定确定污染源。这些均属于疫学因果关系方法的应用。^[10]

第三,从客观归责理论及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具体应用来说,客观归责理论与疫学因果关系的结合旨在解决上文所提及的污染型环境犯罪中涉及的三个主要问题,即因果链条形成难,污染型环境犯罪证明标准高,多因一果刑事责任归属难。首先,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链条形成难,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现有的科学技术无法准确地探究致害因子的发生机理。但这不影响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因为,在客观归责理论中强调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刨除一些自然科学与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具体事实上遵循疫学因果关系依托的流行病学知识及统计学概率知识,同时在行为、结果中贯穿客观归责,这使得因果关系中的致害机理的探究显得更为简单。^[11]这也可以通过客观归责的法律规范避免疫学因果关系自身的推定规则,被视为有疑罪从有之嫌疑。其次,关于污染型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证明的标准问题。对于我国的一些环境案件

的证明标准往往偏高的问题,借助客观归责理论,重视从规范意义的角度去解释因果关系,将证明标准分为实害结果、危险结果,侧重不同危险的层次划分,形成各个危险类型的不同层级的划分,对于一些无实害结果但侵犯了环境权益的行为订立一些具体化标准,也就能更好地区分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这些标准具体体现在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排放相关污染物的衡量标准上,由污染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来界定和控制污染。最后,关于多因一果关系具体归责方面问题的解决。多因一果主要解决结果归属的问题。结果归属最重要的是要在刑事规范保护目的视野下,处理好不同类型行为对结果贡献度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关于多因一果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大体分为四类:1. 多个行为人无意思联络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的直接导致污染结果发生的原因,其中,单独一个行为难以致害,多个行为人之间的行为属于不同属性的行为。2. 多个行为人之间无意思联络的行为属于同类型的行为,但因为每个人的行为由于量少而难以单独产生污染结果。3. 多个行为人不同类型的无意思联络行为,其中一部分是排污行为,另一部分并非一定是排污行为,但与排污行为相结合导致污染损害结果发生。4. 多个行为人无意思联络的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其中每个行为人的行为足以导致结果发生。^[12]对于最后一种归责较为简单,其实是每个人应当承担各自所产生的结果。对于第1种而言,因为各行为人之间的行为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缺一不可,也无法分清你我,对于这种情形应当与共同犯罪的处理方式相同,视其排污行为中相关排污量、排污标准、环境承载力等标准界定各行为人的责任。对于被害人的重大过失可以纳入归责体系考虑。对于第2种与第3种情况,由于每个行为人的行为都不足以导致该结果的发生,所以应当充分考虑当下结果发生是各行为人是否有违反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等,在判断行为人时,注重行为人原因力^①大小以及当地的时间、气候等因素对污染行为的影响,从而分别出主次行为,对于一些企业微乎其微的影响则可以不进行归责。^[13]

①刑法因果关系原因力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在一定的场域内对危害结果所发挥的作用力。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显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对于刑法而言对环境犯罪的治理则显得越来越紧迫。相对于破坏型环境犯罪,污染型环境犯罪更难处理的问题在于因果关系证明。在污染型环境犯罪中,疫学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理论之优点,克服了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困境。笔者相信,从刑事立法目的、精神和刑法的功能出发,运用客观归责理论,结合疫学因果关系,就可以较好解决因果关系链条形成难、证明标准高以及多因一果等三大问题,由此更好地处理污染型环境犯罪问题。

[参考文献]

- [1] 大塚仁. 刑法概说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67-168.
- [2] 刘晓倩. 论疫学因果关系推定法在环境犯罪中的运用[J].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4 (1): 9-12.
- [3] 姚贝. 论污染型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 [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5 (5): 74-91.
- [4] 李冠煜. 污染环境罪客观归责的中国实践 [J]. 法学
- 家, 2018 (4): 127-200.
- [5] 赵秉志, 王秀梅, 杜澎. 环境犯罪比较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4
- [6] 严灵光. 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标准 [J]. 法制与社会, 2016 (20): 68-69.
- [7] 肖丽. 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疑难问题探究 [D]. 济南: 山东大学法学院, 2017.
- [8] 郭莉. 环境犯罪中的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 [J].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 59-62.
- [9] 张明楷. 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 [J]. 法学评论, 2018 (2): 6-24.
- [10] 庄劲. 从一起案例看传染病犯罪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 [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3 (6): 97-102.
- [11] 劳东燕. 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 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 [J]. 中国检察官, 2011 (7): 77.
- [12] 李慧玲, 陈颖. 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研究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4): 56-64.
- [13] 张训. 论刑法因果关系之原因力 [J]. 政治与法律, 2010 (4): 128-139.

(上接第 79 页)

[参考文献]

- [1] 德雷斯勒. 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 [M]. 宏耀,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2] 宋英辉. 刑事诉讼原理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 [3] 樊崇义.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 [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153-154.
- [4] 罗瑾. 有效辩护在中国刑事司法中的引入与适用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5): 565-571.
- [5] 陈瑞华. 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辩护问题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5): 94-105.
- [6] 熊秋红. 有效辩护、无效辩护的国际标准和本土化思考 [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4 (6): 129-135.
- [7] 林劲松.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 (4): 80-87.
- [8] 曹娟. 司改重举措: 八省市试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J]. 中国律师, 2017 (11): 40.
- [9] 曹建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R/OL]. (2017-03-12)[2019-02-16]. http://www.spp.gov.cn/gzbg/201703/t20170320_185861.shtml.
- [10] 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R/OL]. (2017-03-19)[2019-02-17].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320/c64094-29155615.html>.
- [11] 顾永忠.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 [J]. 中国法学, 2016 (2): 71.
- [12] 张军, 姜伟, 田文昌. 新控辩审三人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47.
- [13] 韩旭.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 [J]. 法学论坛, 2015 (3): 134-141.
- [14] 田文昌, 陈瑞华.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10.
- [15] 李奋飞. 论“表演性辩护”——中国律师法庭辩护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 [J]. 政法论坛, 2015 (2): 78-80.
- [16] 张中. 论侦查阶段的有效辩护 [J]. 当代法学, 2017 (6): 25-34.
- [17] 陈瑞华. 有效辩护问题的再思考 [J]. 当代法学, 2017 (6): 3-13.